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八卷
(2005)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合辦

中華書局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八卷

Volume VIII

慶祝饒宗頤先生米壽專號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合辦

中華書局

二〇〇五・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八卷/季羨林,饒宗頤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ISBN 7-101-04468-9

I. 敦... II. ①季...②饒... III. ①敦煌學—研究—文集②文物—研究—吐魯
番盆地—文集
IV. 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15986 號

書 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八卷

著作責任者: 季羨林 饒宗頤 主編

責任編輯: 柴劍虹 梁彥 張進

國際書號: 7-101-04468-9/K·1911

出版者: 中華書局

地址: 北京市豐台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印刷: 北京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發行者: 中華書局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26 印張 46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54.00 元

本書承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資助出版

謹 致 謝 意

編委會(以姓名拼音字母爲序)

主 編

季羨林 饒宗頤

編 委

柴劍虹	陳 明	鄧文寬	方廣錫	郝春文
林悟殊	劉 屹	孟憲實	榮新江	孫曉林
王邦維	王 素	徐 俊	湛 如	張涌泉
趙和平				

編輯部主任

郝春文

副 主 任

劉 屹

編輯部成員

陳大爲 陳麗萍 史 睿 楊 梅

選堂先生米壽獻辭

選堂先生，黃宮斗極，學海崑崙。照耀梓桑，輝光家國。維今米壽方啓，茶齡可期。同人等願言海屋添籌，當效華封稱祝。

獻辭曰：

先生之學術堂構，才備九能，業精六學。燃藜虎觀，問字雞園。搜蟲書鳥語之文，溯龍樹馬鳴之論。可謂通今博古、融中貫西者矣。

先生之文藝製作，以空靈瘦勁之筆，瀉纏綿掩抑之音。歌佛國之凌雲，詠美洲之落日。發林泉之高致，得山水之純全。落筆吟風，撥弦寫月。可謂托旨遙深、審音明晰者矣。

先生之敦煌研究，遠發秘府，西陟鳴沙。推究筆精，披觀墨妙。鑿琵琶譜之混沌，解想爾注之闕疑。可謂沈沈夥頤、戛戛獨造者矣。

夷考先生平昔，才藝博綜。廣見洽聞，飽學多識。早膺預流之選，不愧大師之名。今當金液延齡，必邀赤松等算。同人等時獲教言，每懷感激。爰呈壽頌，遙祝椿年。

時維公元二零零四年，閏逢涓灘之歲，嘉平之月，《敦煌吐魯番研究》同人謹賀。

目 錄

選堂先生米壽獻辭

融貫中西 會通百家——讀《論饒宗頤》感言	柴劍虹(1)
饒宗頤先生與敦煌文學研究	朱鳳玉(5)
略談選堂先生對於吐魯番學的貢獻	王 素(13)
饒宗頤先生敦煌吐魯番學論著目錄	鄭會欣(23)
吐魯番所出高昌“祀天”文書考	姜伯勤(31)
景教富岡高楠文書辨偽補說	林悟殊(35)
論《昇玄經》“內教”與“昔教”的關係	劉 屹(45)
沙州歸義軍史事繫年(大中六年——咸通二年)	榮新江 余 欣(71)
試論敦煌的婦女結社	孟憲實(89)
《俄藏敦煌文獻》中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	陳國燦(105)
關於唐西州都督府是否有“土曹”問題	李 方(115)
中國印刷術傳入西方了嗎?	戴 仁(127)
隋唐五代時期西域外來的眼科知識及其應用	陳 明(137)
敦煌具注曆日選擇神煞釋證	鄧文寬(167)
敦煌占卜文書殘卷零拾	趙 貞(207)
敦煌寫本書儀的文體特色及其在近代漢語辭彙研究上的價值	張小艷(219)
敦煌俗字例釋	黃 征(249)
敦煌文獻詞語續釋	曾 良(259)

敦煌疑偽經的語言問題

——以《普賢菩薩說證明經》為例……………鄭阿財(267)

敦煌本《楞嚴經音義》研究……………張涌泉(287)

兩首被誤讀的曲子詞

——敦煌文學文獻零剝之三……………徐俊(297)

敦煌本《韓朋賦》新論

——談佛經故事之體制對《韓朋賦》的影響……………李秀花(303)

天津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311)

書評

《敦煌習學集》自序……………施萍婷(359)

Richard Salomon : *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陳明(362)

Jan Nattier : *A Few Good Men :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Ugrapariprcchā)*……………陳懷宇(366)

白文固、趙春娥《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妙智(371)

周西波《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劉屹(373)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趙和平(378)

趙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郝春文(382)

李天石《中國中古良賤身份制度研究》……………劉進寶(387)

新書目……………(395)

**Dedication to the Eighty-eigh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Volume VIII
Contents**

Editors

Impressions of On Jao Tsung-i: Combing east and west, channeling various schools	Chai Jianhong
Contribution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to the Turfan studies	Wang Su
Professor Jao Tsung-i and Dunhuang literature studies	Chu Feng-yu
Publications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on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Zheng Huixin

Articles

Gaochang texts of Heaven-God worship unearthed in Turfan	Jiang Boqin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omioka and Takakusu's Nestorian manuscripts	Lin Wush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jiao and Xijiao in the Shengxuan Jing	Liu Yi
Chronology of events in the Guiyi Military of Shazhou (852 – 861)	Rong Xinjiang and Yu Xin
Women Associations in Dunhuang	Meng Xianshi
Whether there was shicao in the Dudufu of Xizhou during Tang period?	Li Fang
Did Chinese printing technology transport to Europe?	Jean-Pierre Dr ge
Ophthalmic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Regions and its applications: 6th – 10th centuries	Chen Ming
Demons in Dunhuang calendar books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ies	Deng Wenkuan
Notes to the Dunhuang fragmentary books of divination	Zhao Zhen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model of letter writers found in Dunhuang and its value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vocabulary	Zhang Xiaoyan
Vernacular characters from Dunhuang with examples	Huang Zheng
Words and phrases in Dunhuang documents; supplementary notes	Zeng Liang
Studies on Dunhuang MSS Lengyan jing yinyi	Zhang Yongquan
Puxian pusa shuo zhengming jing; Linguistic issues of a Dunhuang Apocrypha	Cheng A-tsai
Two misread pieces of Lytics; Notes to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literature (III)	Xu Jun
The Hanpeng fu from Dunhuang; New discussions on influence by the style of Buddhist stories	Li Xiuhua
Dunhuang Manuscripts kept in the Tianjin Library; A catalogue	Historical Documents Division of Tianjin Library

Book Reviews:

Author's preface to <i>Study from Dunhuang</i>	Shi Pingting
Tomothy Lenz, with contributions by Andrew Glass and Bhikshu Dharmamitra, <i>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6 + 25</i> (= Gandhāran Buddhist Texts, Volume 3)	Chen Ming
Jan Nattier, <i>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Ugrapariprocchā)</i>	Chen Huaiyu
Bai Wengu and Zhao Chun'e, <i>Buddhist Registers for Monks and Nuns in Traditional China</i>	Miao Zhi
Zhou Xibo, <i>On the Du Guangting's Taoist Ritual Documents</i>	Liu Yi
Lin Wushu, <i>New Reflections on Nestorianism of the Tang Dynasty</i>	Zhao Heping
Zhao Heping, <i>On the Gantang Ji from Dunhuang</i>	Hao Chunwen
Li Tianshi, <i>Status System of Noble and Humble Classes in Medieval China</i>	Liu Jinbao

New Publications

融貫中西 會通百家

——讀《論饒宗頤》感言

柴劍虹

說來慚愧，鄭焯明先生十年前所編《論饒宗頤》一書（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版），我最近纔從友人處借得。雖然其中有一些熟悉的內容，而另外的許多都是我淺陋的學識所不能讀懂的，但感動與感想還是有的，故撰此短文，以為饒公米壽之賀。

我最早聽別人講述饒公的學問，是1982年在京西賓館參加李一氓老主持的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會議期間，當時將編撰《全明詞》的任務，分配到饒公名下，因為他是著名的詞學專家，衆議非他莫屬。後來，我寫俄藏敦煌詞的論文，拜讀了他與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合著的《燉煌曲》，纔知道他又是卓有建樹的敦煌學家。1985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參加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我向大會提交了關於敦煌寫本《長安詞》的論文，得以有當面向饒公求教的機會，從此不斷聆聽教誨，對饒公博大精深的學問與傑出的書畫才藝也有了一些具體的認識。然而，感性的印象不免粗淺，往往祇停留在望嶽讚歎的地步，很難理出頭緒，並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此番硬著頭皮通讀了《論饒宗頤》全書，雖然有許多讀不懂的學問，卻猛然領悟到饒公的治學風格與我這些年一直思考着的敦煌學的學術品格有相通之處，這就是“融貫中西，會通百家”。下面就集中結合饒公研治敦煌學的成就來談談我的些許感想。

饒公對敦煌學的貢獻，榮新江教授在評述饒先生與敦煌學的文章中，用了這樣幾句話來概括：發前古之秘，鑿破混沌；開創敦煌琵琶譜與書法研究；搜蟲書鳥語之文，溯龍樹馬鳴之論（參見《論饒宗頤》，頁97—100）。這裏涉及對敦煌遺書中的宗教典籍文獻、文學作品、語言材料及曲譜、繪畫、書法等多方面的整理研究，正好充分顯示了一位“業精六學，才備九能”的學術大家的旨趣與學養。需要指出的是，與我們通常說的“一專多能”不同，饒公是以詞人、詞學家的身份研究敦煌曲詞，以文學史家的眼光審視敦

煌變文，以史學家的才識來校證敦煌本道教秘笈，以古琴行家的熱誠來考察敦煌曲譜，以書畫名家的靈慧來探索敦煌書畫藝術的真諦……如此等等，可謂六學皆當行，九能顯本色，所以是得心應手、融會貫通、相得益彰。在感歎之餘，我不由地又要引述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的一段話：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季羨林先生據此斷言：“從饒宗頤先生的全部學術論著來看，我可以肯定地說，他也已得到了預流果。”（見《論饒宗頤》，頁219）仍需要強調的是，敦煌學並非一般的新學術潮流，而是“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它應有自己獨特的學術品格；治學者要預於此潮流，也應該追隨、貼近乃至符合它的學術品格。我認為，近世考古發現的新材料層出不窮，並不是取用任何的新材料、新問題，都能形成學術的新潮流；即使能形成某種“新學”“顯學”，也並非都能成為世界性的新學問。這就涉及敦煌材料與論題的特殊性。莫高窟現存橫跨千年的精美壁畫、雕塑，藏經洞所出數萬件4—11世紀的珍貴文獻，不僅帶有絲路咽喉這個特殊地域的印記，而且閃爍着中外文化交流結晶的光輝。世界四大古老文明在這裏交彙相融，中華儒學、諸子百家與釋、道、祆、摩尼等宗教在這裏兼容並存，成就了一座獨一無二、豐富無比的古代文明的信息庫。研究這樣的新材料，必然要牽動各國的學人，使用各種方法，提出世界性的新論題，求索新答案，形成新潮流。預此潮流的基本條件是學養既深且廣，而其最高境界則是融貫中西、會通百家。在追溯當年敦煌文物流散的過程中，人們會理所當然地批判晚清政府及官吏的腐敗無能，痛恨外國盜寶者的劫掠，卻往往會忽視另外一種因素——人文素養——所起的作用。換句話來說，如果人們不能認識敦煌文物的真正價值，便無法有效地保護它、研究它；而如伯希和般行家裏手似地劫奪，是最難防備的；學者要預敦煌學之流，也必須努力追尋與貼近它特殊的學術品格。這是敦煌文物一面世便迅即流散到英、法、俄、日各國的緣故，也是從王國維、羅振玉、陳垣、陳寅恪到向達、王重民、姜亮夫、潘重規等學術大師都成為中國敦煌學界的先驅與領軍人物的根本原因。近半個世紀以來，饒公便是以其淹博的學識，繼承與發展了上述大師的風格，成為敦煌學研究界涉獵面最廣、影響力甚巨的一代宗師。

《論饒宗頤》一書的編者，將饒公的學術及創作成就，分為敦煌學、史學、楚辭學、詞學、文學創作、藝術創作、綜論等七個方面來評述，雖然這還不能涵蓋饒公的治學範圍，

從學科劃分來看也不盡科學，但畢竟可以使我們大致領略饒公之豐采，也可以從學術交叉之中體會敦煌學的品格。因為從本質上來講，敦煌學是中西古今交彙之學，是多種學科相輔相成之學，也是特殊的地域文化與主流文化相輝相映之學。饒公治敦煌學，單就文學方面而論，即涉及詩歌、曲詞、變文、文論、楚辭、文選等，而又有他本人卓異的文學創作做基礎；再以他研治“敦煌琵琶譜”而論，即基於宋人的音樂理論，並將曲詞與曲譜、舞譜結合起來研討，亦有他精湛的古琴修養為根柢。如此研究，豈能不得敦煌文獻之精髓與真諦？錢仲聯先生為饒公《固庵文錄》所作的序中有云：“今選堂先生之文，既有觀堂、寒柳融貫歐亞之長，而其精通梵文，親履天竺，以深究佛學，則非二家之所能及。……至其散體，所考釋者，自卜辭、儒經、碑版以迄敦煌寫本；所論說者，自格物、奇字、古籍、史乘、方志、文論、詞學、箋注、版本，旁及篆刻、書法、繪畫、樂舞、琴藝、南詔語、蒙古語、波斯語，沉沉夥頤，新解瀾翻，兼學術文美文之長，通中華古學與四裔新學之郵。”（見《論饒宗頤》）於是我又聯想起“莫高窟藏經洞的性質”這個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論題。

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着“藏經洞藏品內容與性質的關係”這個問題。作為絲路樞紐的佛教聖境千佛洞，其“藏經洞”蘊涵的並非單純的佛教文物典籍，儘管其中佛經寫卷所佔比例較大，而政治、經濟、歷史、地理、軍事、科技、藝術、語言、民俗、醫藥、體育類非佛文獻材料亦十分豐富；即以宗教典籍而論，除釋氏外，道家、祆教、景教、摩尼的寫本也有不少；從語言文字看，漢文寫本之外，又有吐蕃、回鶻、于闐、婆羅謎、粟特、西夏、古梵文等多種民族語文寫本，已經大大超出了“佛教文化”的範疇。就此，我得到三點啟示：其一，古代敦煌地區是中外各民族、各宗教文化進行交流與創新的廣闊舞臺；其二，歷史賦予處於敦煌這個特殊環境的人敢於解放思想，兼收並蓄，便於瞭解外來信息，易於接受新鮮事物；其三，莫高窟作為寺院教育、平民教育與貴族教育相結合的理想場所，藏經洞可能是一個保存了特殊教育信息的“資料庫”或“圖書館”。我又想起了莫高窟的代表窟之一：第156窟的壁畫“張議潮出行圖”與“宋國夫人出行圖”，其中所蘊涵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內容與前述三點是相契合的。藏經洞裏恰好有這位敦煌地區的最高統治者做“學士郎”時抄錄的詩歌，也許還有他未署名的其他“作業”（如一些經濟文書），而那些四部典籍，各種文字的宗教寫卷，以及書儀、曆法、地理、曲譜、舞譜，乃至醫方、占卜書、解夢書等等，是否都是起初的學士郎們及後來的僧尼、文人、將帥所必讀的教科書或選修的參考書呢？還有多種堪稱最高水準的書聖王羲之、智永草書臨本，歐陽詢化度寺塔銘與唐太宗溫泉銘的唐代拓本，不也顯示了這些珍品的主人的高雅修養嗎？至於

千佛洞中那些佚名作者的壁畫、雕塑，均代表了那個時代最出色的藝術風範。如此等等，都使我們有理由推測藏經洞文獻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無論其身份地位，均應是文化傳統的繼承人及文化交融的受益者，而且其中不乏“融貫中西、會通百家”的高手大師，如令狐崇哲、洪辯、法成、張議潮、悟真等人。因此，今人要很好地理解與研究藏經洞的文獻，要預敦煌學之流，自然也應該在更準確地把握敦煌歷史文化內涵的基礎上，進而弄清藏經洞的性質，創建獨立的、完整的、科學的敦煌學學科系統與理論。

所以我要說，饒公以其在敦煌學上多方面的建樹，為我們不斷追尋與貼近敦煌學獨特的學術品格，樹立了一個典範。

（作者工作單位：中華書局）

饒宗頤先生與敦煌文學研究

朱鳳玉

一 前言

1900 年敦煌藏經洞發現數以萬計的寫本文書，旋即在世界近代學術史上產生了無比的光與熱，發揮無比深遠的影響，由於各國學者對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文物與敦煌石窟壁畫塑像等藝術的研究，興起了一股研究熱潮，並發展成為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

然而此一歷史上偶然的發現，卻因錯綜的時代因素，迭遭英、法、日、俄等國的掠取而大量流散國外，各國學者各就所長，憑藉此寶貴的新資料，紛紛加以鑽研，從而獲得極為豐碩的學術成果。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便深深地感受到：“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而慨嘆地說：“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1]這在敦煌學發展的初期，確實是不爭的事實與無奈。

回顧我國的敦煌學研究，雖初期有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蔣斧、王仁俊等學者，開創我國對敦煌遺書的介紹、研究，但僅能憑藉國內公私藏卷及伯希和所提供的部分英、法藏卷照片，撰寫序跋、提要而已。其後，隨着學者的往來英、法等國，抄錄寫卷，披閱資料；或作敘錄，或作研究，成績乃漸有可觀。

敦煌學是以文獻資料為核心的新興學科，內容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儒家經典、史地、語言、文學、社會、經濟、法律、政治、教育、公私文書、天文曆算、兵法、醫藥、術數、繪畫、音樂、舞蹈……等文獻。學者在面對如此龐雜而多樣的寫卷內容，能從中擷取精華進行研究已屬不易。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則是兼跨敦煌學的許多研究領域且有具貢獻的一位。他在敦煌學的研究上，不論是道教文書、禪家史料、樂舞文獻、畫稿、曲子詞……等諸多方面，均多所論述、校輯、纂錄，研究範圍之寬廣，夙為學界所稱道。余近期因執行“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計劃^[2]，於前

輩學者對敦煌文學研究的成果與方法進行考察，今欣逢饒選堂先生米壽之慶，乃草撰此文，以爲祝嘏。

二 饒先生的敦煌學研究

饒宗頤先生，字固庵，又字伯子，號選堂。1917年6月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出身書香門第，頗富藏書。幼承家學，厚植學問根柢。於文學、藝術多所習染，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尤好佛道典籍。十七歲時續成出版先君遺著《潮州藝文志》聞名，而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並助葉恭綽先生編《全清詞鈔》。1949年後移居香港，先後執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主任，並曾從事研究或講學於印度班達伽(Bhandarkar)東方研究所、法國科研中心(C. N. R. S.)、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遠東學院(E. F. E. O.)、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E. P. H. E.)和日本京都大學等高等學府。退休後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

先生於古文字多所涉獵，兼綜文、史，工書畫。治學多闢蹊徑，著作等身。於敦煌學研究多有貢獻，2000年獲頒“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

饒先生從事敦煌學研究，始自50年代。1956年4月，發表第一部敦煌學相關論著《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3]；又同年出版的《楚辭書錄》，書中亦根據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笈留真新編》校錄了《隋僧道騫〈楚辭音〉殘卷校箋》^[4]，可說是饒先生對敦煌傳統集部整理研究的開始。之後的五十年間，有關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發表的相關論著篇章超過五十餘種。內容涉及書法、繪畫、音樂、舞蹈、語言、文學及宗教，範圍至爲廣泛，影響亦頗爲深遠^[5]。

饒先生人稱潮州才子，精通詩詞、書畫，於中國古典文學多所鑽研，因此對於敦煌文學文獻尤所關心。《敦煌本文選輯證》則是他對敦煌文學研究的重要開端。近五十年來，對於敦煌學研究論著多矣。（請參看本書中之“饒宗頤先生敦煌吐魯番學論著目錄”。）

就中國文學的立場來看，敦煌文獻的發現，其中除了傳統的四部要籍外，最重要的當是變文、曲子詞等。另一方面，又由於文學相對於其他學科而言，它和民族的心理關係最爲密切，中國學者在這一方面有一種天然的優勢，最能理解中華民族的心理，因此在敦煌學的發展過程中，在敦煌文學作品的探究上，中國學者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學者，自有一種獨特而有利的條件。正因此，中國學者對敦煌文學研究開始較早，成就也最突出，成果也最豐碩^[6]。饒先生出自文風鼎盛的潮州，幼承家學，諳熟嶺南文獻掌故，又

嫻熟文選、熱愛詩詞，在接觸敦煌文獻時，對於傳統文集及最受文壇、學界矚目的曲子詞等文學作品之整理與研究，特為深入，成就也特別突出。茲舉其犖犖大者，略述如下，以見其一斑。

三 敦煌本《文選》研究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一書，自隋至今，一直是學文者必讀之書，長期以來“文選學”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學的根柢，因此素有所謂“文選爛，秀才半”之說。康有為《桂學答問》有云：“文先讀《楚辭》，後讀《文選》，則才骨立矣。”饒先生深自服膺康南海之言。早年治《楚辭》，而有《楚辭書錄》之作，對敦煌本《隋僧道騫〈楚辭音〉殘卷》有所鑽研。同時對於《昭明文選》研究亦多用力。先生在《選堂字說》一文中，自我表白取號“選堂”之因由時，說：“或問余曰：子曷以選堂名齋？應之曰：平生治學，所好迭異。幼嗜文學，寢饋蕭選；以此書講授上庠歷三十年。”^[7]

唐代文選學發達，選學著作繁多，舉凡曹憲《文選音義》、許淹《文選音》、公孫羅《文選音義》、《文選注》，李善《文選注》、呂延濟等《文選五臣注》……等，不一而足，後世或存或佚。近世敦煌石室寫本重現，就中多有《文選》寫卷，或音、或注、或白文，要皆唐人寫本，於保存唐代《文選》著作原貌及文字校勘極具價值。饒先生對此珍貴文獻，尤所關注。

1957年即先後發表了二篇《敦煌本〈文選〉斠證》，將英、法所庋藏敦煌文選寫本一十六種，依其卷次表列，並將與文選有關之寫卷會最，進行斠證。之後，敦煌本《文選》一直成為饒先生的研究專題，更擴及吐魯番本《文選》的蒐羅與整理。其對研究資料積累尤具耐心，2000年5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他所編的《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可為代表。此書編印構想，始自1957年《敦煌本〈文選〉斠證》的發表，歷時四十多年，網羅資料，從原先的十六種寫本，點滴積累，而至現集的三十餘件。前有《唐代文選學略述》、後有《敦煌吐魯番本文選》敘錄，末附精美圖版，其成果可說較為全面而完整。既是敦煌本文選之集大成，也是唐代選學研究的重要參考。

四 敦煌曲研究

詞學整理與研究，是饒先生早年學術研究的重心。時間可說從1939至1941年間，曾協助葉恭綽先生編《全清詞鈔》開始。之後，1963年出版了《詞籍考》一書，對明代以前詞書，羅列資料，細為考定。後正值歐洲漢學界正執行“宋計劃”，主持計劃的法國巴

黎大學及高等研究院乃邀先生參與。之後，法國漢學泰斗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有鑑於饒先生對詞學研究的成果，遂邀請共同合寫《燉煌曲》一書。這也是饒先生在敦煌文學研究的領域裏最大的成就。

全書計分：法文、中文、圖版三部分。茲將目次抄錄如下：

引論——敦煌曲與詞之起源

弁言

上篇 敦煌曲之探究

一 敦煌曲之訂補

二 敦煌曲之年代問題

三 敦煌曲之作者

中篇 詞與佛曲之關係

一 詞之起源與佛曲(讚詠)兼論敦煌所出之佛讚集

二 詞與法樂(法曲)梵唱及僧人之改作舊曲

三 偈讚與長短句

四 讚詠在道釋文學上之發展及其曲子之分途

五 和聲之型態及其在詞上之運用兼論佛曲之樂府

六 敦煌曲與樂舞及龜茲樂

七 敦煌曲與寺院僧徒

下篇 詞之異名及長短句之成立

一 詞之異稱

I 雜曲及曲子

II 雜言

III 倚聲、填詞

IV 小詞、小歌詞

V 語業、長短句

二 敦煌卷中「詞」字之異義

三 詞在早期目錄書中之地位

結語 附：詞與樂府關係之演變表

敦煌曲繫年

本篇